

■ 唐诗研究

试论唐诗学建构的主流与非主流

——以李白接受史中的主流与非主流因素为例

朱易安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唐诗学发展史的体系建构,除了诗学本身外,其他文化诸种因素也应一并考虑,它们与诗学本身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系统。影响唐诗学建构和发展的非主流因素,有如唐代诗人传奇故事的流传、与唐诗相关的戏曲小说的演绎、艺术作品传播与唐代诗歌接受中的再塑造、唐诗与文人生活需求的变化等等,它们在唐诗学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是唐诗具有永久生命力的动力。例如李白的身世、传说等“非主流”因素在其接受史中有着重要作用,并且又与“主流因素”纠缠一起,互为促进。

关键词: 唐诗学;李白;接受史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10)01-0090-06

收稿日期: 2009-09-17

基金项目: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基金项目(530403)

作者简介: 朱易安,女,上海市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0年前,我在《略论唐诗学史的建构体系》^①一文中坚持认为,唐诗学发展史的体系建构,除了诗学本身以外,其他的文化诸种因素同样也是这个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唐诗学发展史的研究,必须首先把握这个体系建构,将诗学的发展和诗学以外的诸种有关因素一并考虑,并把它们与诗学本身有机地结合起来,看作一个完整的系统,同时摆正诸种因素在这个系统中的位置,阐述这些因素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诗学发展的综合影响。这才有可能比较清楚地描述唐诗学的发展过程,并且对诸种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影响唐诗学建构和发展的诸种因素,合理地有序地放置在这个完整系统的相应位置中,并能合理地解释它们之间的依存关系和互动关系——这就是我当年有关唐诗学史研究的理论体系构想。

什么是影响唐诗学建构和发展的诸种因素?当时考虑比较多的是,社会政治制度、文学思潮及某种

创作倾向以及特定时期文人的心态。主要依赖的研究材料也是以唐诗别集和总集、历代的诗学著作等为主。毋庸置疑,这些应当是构成唐诗学体系的主流;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新成果的不断涌现,我们会发现,主流以外,还有许多渠道传递的信息,也是唐诗学以及唐诗学成为“热学”的因素,只是我们过去更注重主流因素,而忽略了非主流的因素。

什么是非主流的因素?我认为,非主流的因素是指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被重视的,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未被重视的因素是不重要的。

我觉得至少能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这些非主流的因素:1 唐诗在后世的流传,唐代诗人的综合魅力;2 唐诗的传播途径,除了别集与选本,与后世新兴的文学样式如戏曲小说相关;3 艺术作品传播与唐代诗歌接受中的再塑造相关;4 唐诗与

^① 参见于《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

文生活需求的变化相联系。

上述的因素之所以被认为是“非主流”的,是因为主流文学史忽略大众审美和美学趣味,而事实上文人的美学趣味与大众美学趣味是相交叉的。这些“非主流”的因素,在唐诗学的发展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唐诗具有永久生命力的内在动力。这些“非主流”因素同时也是唐诗和唐诗学获得广泛关注的根本,是唐诗获得普及效应的重要因素,而这种效应又是唐诗学构成的重要部分,研究这些“非主流”的因素,并把它们合理地“安置”在唐诗学的体系之内,对于解释今天读者对唐诗的兴趣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与传承,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这一方面的材料很多,范围也很广。本文则以李白接受史中的主流与非主流因素为例,来讨论“非主流”因素的开掘以及“主流”与“非主流”因素的相互关系。

一、身世和传说等“非主流”因素的蔓延与扩大

李白的诗歌文本真正开始受到关注,要从萧士赟的《分类补注李太白集》开始算起。在此之前,李白的声望更多依赖各种富有传奇色彩的记载而不断扩大。已有学者详细考证了太白星精、谪仙、捉月骑鲸等传说的形成过程,认为是通过李阳冰的《草堂集序》唐人的笔记以及李白诗歌的夸饰诗句将事件和传说联系起来,其中有许多附会的因素^{[1] 34-40},但却产生出一种“集聚效应”,构成了一个“谪仙人”具体而生动的形象。直到清代以前,这些荒诞不经的传说很少受到质疑,而不断地为诗人或评论家津津乐道。

有关李白身世和传说等“非主流”因素的蔓延与扩大,其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李白诗文的文本流传缺位。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所说的“主流”缺位。李白诗文集的编纂在唐代大约有三次,第一次是魏颢编辑的本子,编纂时李白尚在人世;第二次是李白去世后李阳冰编纂的本子;第三次是范传正为李白迁墓时收集的作品。但这三个系统的文本在宋代已面目全非,因此,今天能看到的南宋初蜀刻本《李太白文集》30卷,是宋敏求等人重新编纂的。另一个系统的咸淳本《李翰林集》,目前能见到的只有明清的翻刻本,这也是学界认为有伪作窜入的依据^{[2] 280},也说明宋人阅读李白全集文本的困难。其实李白诗文集在唐代的编纂同样也不顺利,魏颢和李阳冰及范传正都提到许多作品已经散失的事实。如魏颢的《李翰林集序》记载編集情况时说:

“颢平生自负,人或为狂,白相见混合,有赠之作,谓余尔后必著大名于天下,无忘老夫与明月奴。因尽出其文,命颢为集。”虽然李白在世时曾将诗文托付给魏颢,但当时并未能完整保存;“经乱离,白章句荡尽”,直至“上元末,颢于绛偶然得之。……首以赠颢作,颢酬白诗,不忘故人也。次以《大鹏赋》古乐府诸篇积薪而录,文有差互者两举之”。魏颢对李白诗文散失严重十分遗憾,只能希冀李白继续有新作:“白未绝笔,吾其再刊。”^{[3] 1790-1791}李阳冰《草堂集序》亦称:“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3] 1789}范传正面临同样的问题:“文集二十卷,或得之于时之文士,或得之于宗族,编辑短简,以行于代。”^{[3] 1782}

在这种情况下,文本阅读接受方式就会被另一些接受方式所替代,我们姑且把它称作“替代阅读”。原先处于“非主流”地位的“传说”效应就会自然地蔓延并扩大,以弥补“主流”的缺位。从目前可以见到的唐人记述中,这些“非主流”的传说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李白天宝年间在京城里的奇闻;第二是李白生平及逝世的传说。根据时间先后的排列,可以见出传奇色彩日渐浓烈的变化。如魏颢序中记叙的李白,主要集中于有关“谪仙”的传说:“白久居蛾眉,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大鹏赋》时家藏一本,故宾客贺公奇白风骨,呼为谪仙子。由是朝廷作歌数百篇。上皇豫游召白,白时为贵门邀饮,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许中书舍人。以张垞谗逐,游海、岱间,年五十余尚无禄位。”述及李白的形象时则稍有夸张:“万之日不远命驾江东访白,游天台,还广陵见之。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或时束带,风流酝藉。曾受道箓于齐,有青绮冠帔一副。少任侠,手刃数人。”^{[3] 1790}

但在李阳冰的序中,则已经出现了有关李白出生的传说和天宝年间在朝中受到恩宠的细节描述:“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

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3] 1789}

有关李白的传说约于元和以后开始热闹起来,不仅散见于唐五代的笔记小说中,就连比较严肃的碑记中也大量采纳。我们试比较刘全白作于贞元六年(790)的《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和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就可以发现这种变化。

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传奇色彩并不浓郁,只是指出李白:“性倜傥,好纵横术,善赋诗,才调逸迈,往往兴会属词,恐古人之善诗者亦不逮。尤工古歌。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有关史实仅提到“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因为和蕃书,并上《宣唐鸿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纶诰之任委之。同列者所谤,诏令归山。遂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又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流离坎坷,竟无所成名。”^{[3] 1779}

到了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几乎囊括了有关的传说,并进一步具体化:“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刚气,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瑰奇宏廓,拔俗无类。少以侠自任,而门多长者车。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度弘大,声闻于天。天宝初,召见于金銮殿。玄宗明皇帝降辇步迎,如见园、绮。论当世务,草答蕃书,辩如悬河,笔不停缀。玄宗嘉之,以宝床方丈赐食于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无比侔。遂直翰林,专掌密命。将处司言之任,多陪侍从之游。他日泛白莲池,公不在宴。皇欢既洽,召公作序。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优宠如是。既而上疏请还旧山,玄宗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恐掇后患,惜而遂之。……在长安时,秘书监贺知章号公为谪仙人。吟公《乌栖曲》云此诗可以哭鬼神矣。时人又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朝列赋谪仙歌百余首。”^{[3] 1780-1781}

根据范传正文中有“传正生唐代,甲子相悬。常于先大夫文字中见与公有浔阳夜宴诗,则知与公有通家之旧”的记载,可以判断,范传正因父辈与李白的关系,唐元和十二年(817),将李白墓由龙山迁葬青山^{[4] 180},并亲撰新碑文。迁墓之时,距李白下世已近60载,范氏所记的各种传说,可能已在民间广泛流传。换句话说,是将传说已久的李白逸事正本化。如果比较一下新旧唐书本传,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相关性:

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时侍御史崔宗之谪官金陵,与白诗酒唱和。尝月夜乘舟,自采石达金陵,白衣宫锦袍,于舟中顾瞻笑傲,旁若无人。初,贺知章见白,赏之曰:此天上谪仙人也。^{[5]《本传》}

天宝初,南入会稽,与吴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沉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醒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撻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璣、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白浮游四方,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6]《本传》}

至此,关于李白的各种传说,几乎与他的诗文创作一样,被载入史册。

二、“非主流”传说与李白作品的关联

仔细研读,其实可以察觉,有些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只是不断地增加了色彩渲染,演绎而成。例如,有关“谪仙”的传说,最先出自于李白的诗中。《对酒忆贺监二首并序》序云:“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殁后对酒,怅然有怀而作是诗。”诗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3] 1362}“谪仙”一词又见于李白其他的诗句,如《玉壶吟》“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3] 卷七 484};《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3] 1098}“谪仙”至孟棨《本事诗》,便形成一则完整的故事:“李太白初自蜀至今,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

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也!’^[7]高逸第三¹⁵联系到“太白星精”的传说,极有可能是从“谪仙”附会而产生,而这种附会的源头则依然要追溯到李白自己的身上。最简单的道理,母亲生孩子做梦的事,自然只有最亲近的人才可能知道。如果自家人不往外说,别人又如何知晓呢?况且魏颢、李阳冰及范传正的文中所罗列的李白事迹,多半出自诗人自己或诗人的亲属的叙事,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李白被玄宗召见金殿,备受宠遇一事,白之诗文中也曾多次称道,如《为宋中丞自荐表》“上皇闻悦之,召入禁掖。既润色于鸿业,亦间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3]⁵¹⁸《东武吟》诗:“恭承凤凰诏,敕起云萝中,清切紫霄迥,优游丹禁通。君王赐颜色,声价凌烟虹。”^[3]³⁹⁸《玉壶吟》诗云:“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3]⁴⁸⁴这些诗歌很可能演绎成比较具体的细节描绘,如李阳冰《草堂集序》所说的那样:“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3]¹⁷⁸⁹李白还有一些诗歌描绘进京以后达官贵人争相与他结交的场面。例如《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3]⁶²⁵《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万岁,拜贺明主收沉沦。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钩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一朝谢病游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3]⁷⁴⁸于是,“赐宫锦袍”、“力士脱靴”等传说便应运而生。关于“力士脱靴”的传说始见于张祜诗《梦李白》“中人高力士,脱靴羞欲乐。”^[8]卷¹⁰似中唐以后此事便已广泛流传,在李肇《国史补》中,脱靴事已演绎得情节生动:“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词,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阍排出之。”^[9]卷^上后来在段成式《酉阳杂俎》中,故事情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10]前集¹²此记载已将李白为玄宗赋新词和

高力士挑唆杨妃联系起来,丰富了故事情节:“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会花方繁开,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子弟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牋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醒未解,因援笔赋之:‘云想衣裳花想容……’龟年遽以词进,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颇梨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意甚厚。……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缝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始谓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然之。上尝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11]²有意思的是,李白描绘进京以后达官贵人争相与之结交的诗句,颇有得意之态,但并未引起后世读者的反感。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曾经注意到这样的情况:“观其诗中如‘中宵出饮三百杯,明朝归揖二千石’;‘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之类,浅陋有索客之风,集中此等语至多,世但以其辞豪俊动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亲’,宜其终身坎壈也。”^[12]卷⁶这在另一个层面上说明,李白既定的形象已经深刻地影响后世读者的接受角度,后世读者对李白的接受,会产生一种偏好性、选择性的接受。

有关李白的传说,虽然有许多附会和传奇色彩,但总体来说,却仍然符合诗人的行为风格。这种演绎,或许又与李白的文风有关。运用语言文字,铺张恣肆,以激荡人心的文字作情节渲染,这似乎是李白的最大特点。虽然目前无法考证,某些传说可能出自李白自己的传播或渲染,但李白描述自己形迹的语言,读起来似乎也充满着传奇色彩。如《上安州裴长史书》“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是白之轻财好施也。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禪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

东。”^{[3]卷26}这样的例子在李白现存的作品中还可以找到,因此,似乎可以怀疑,相关传说的最初来源,可能与李白本人的作品以及自述有关。当这些传说为大家津津乐道之后,演绎的细节便会变得越来越丰满,甚至与原先的事实相违。

三、“主流”与“非主流”因素的变換

笔记小说中具有传奇色彩的记载,吸引着唐人和后世的读者,于是便造成了传说和附会的成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李白诗歌的阅读和接受。而后世诗人咏李白的作品,也被看做诗学主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反过来巩固并扩大“非主流”的影响。如皮日休的《七爱诗》之一《李翰林》“吾爱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迹作人间客。磊砢千丈林,澄澈万寻碧。醉中草乐府,十幅笔一息。召见承明庐,天子亲赐食。醉曾吐御床,傲几触天泽。”^{[13]卷10}就是一例。如果说,笔记小说中的记载尚属不太可信的资料,那么,作为一种评价写入论诗之诗,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它的公信度。同时也说明,李白接受历史中“主流”与“非主流”因素是互动的,而“非主流”的因素,在李白接受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李白诗歌具有永久生命力的内在动力。在后人歌咏李白诗歌作品中,这些“非主流”的传奇情节将李白的形象和精神具象化,突出了他“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14]卷26任华《杂言寄李白》}的人格魅力。

这一“主流”与“非主流”因素的互动的。对于李白接受史而言,最早可以溯源到杜甫。杜甫现存14首涉及李白的诗,其中也是将李白的人生和诗风混为一体作评价的:“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15]卷1《赠李白》}“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15]卷2《饮中八仙歌》}“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15]卷1《春日忆李白》}“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15]卷8《蜀李十二白二十韵》}“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15]卷10《不见》}

在杜甫的诗中,已经形成了比较丰满的形象:李白是一个“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猖狂而不能融入世俗的“谪仙”,除去“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敏捷诗千首”等少量诗句是对李白诗歌艺术的评价,更多的是对他怀才不遇的同情和劝慰。杜甫似乎把李白的嗜酒、傲岸性格以及一切超乎寻常的举动都与他的“谪仙”品性联系起来,李白在杜甫

笔下被强调的“谪仙”特征,也成为解释他与当时其他诗人截然不同的依据。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判断,李白的形象及其诗歌风格的界定,究竟有多少是由后世读者通过他本人诗歌文本的直接阅读得到的,还有多少是从杜甫以及其他人的赞扬和评论中获得的。但至少说明一点,就是杜甫以后的许多诗人对李白的崇敬,不仅缘于李白的诗才,而是他的综合魅力。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宋元以后也是如此。许多人读李白的诗作,不同于读杜诗那样,徜徉于诗歌原作的意境或意象之间,而是通过他的诗歌,结合各种传说,去体验和复原传说中的李白形象。如北宋田锡的《读翰林集》“太白谪仙人,换酒鹔鹕裘。扁舟弄云海,声动南诸侯。诸侯尽郊迎,葆吹罗道周。哆目若饿虎,逸翰飞灵虬。落日青山亭,浮云黄鹤楼。浩浩歌谣兴,滔滔江汉流。下交魏王屋,长揖韩荆州。千载有英气,藺君安可俦!”^{[16]卷43}入元以后诗坛对李白的关注胜于宋代,而关注的视角则扩大了对传奇色彩的感叹和体验。如任斯庵的《白下亭》“金銮殿上脱靴去,白下亭东索酒尝。一自青山冥漠后,何人来道柳花香!”^{[3]附录四}又如舒頔的《李谪仙》“召对金銮殿,荣膺白玉堂。气吞高力士,眼识郭汾王。醉骨生疑蜕,诗名死更香。何由见颜色,月落照空梁。”^{[17]附《北庄遗稿》}

另一个现象是后代的诗人有许多“梦李白”的作品。“梦李白”似也可以追溯到杜甫的《梦李白二首》但后世诗人并未见过李白,因而这种“梦”,就和杜甫的作品有质的不同,而是更直接地转述了自身的某种期望。如五代蜀何光远《鉴戒录》记张孜梦李白事云:“懿宗之代有处士张孜,本京兆人,耽酒如狂,好诗成癖。然于吟讽终昧风骚,尔来二十余年,不成卷轴。孜与李山甫友善,常为山甫鄙之。张乃图写李白真仪,日夕虔祷。忽梦一人自天降下,飒曳长裾。是夕星月晃然,当庭而坐,与孜对酌,论及歌诗。孜问姓名,自云李白。孜因备得其要,白亦超然上升。孜后所吐篇章悉干教化,当时诗者稍稍善之。有《遇雪》云:‘长安大雪天,鸟雀难相觅。其中豪贵家,捣椒泥四壁。到处生红炉,周回下罗幕。暖手调金丝,蘸甲斟琼液。醉唱玉尘飞,因融香汗滴。岂知饥寒人,脚手生皴劈。’又《庚子年遇赦》云:‘时清无大赦,何以安天下。直到赤眉来,始寻黄纸写。草草蠲赋役,忙忙点兵马。天子自蒙尘,何曾济孤寡。’又驾在蜀日,孜著杂言数篇,伤时颇切。其一首两联云:‘只爱轻与肥,不忧贫与贱。著牙卖朱紫,断钱除举选。’及驾还京之后,相府遣人捕之,孜

乃易姓越淮而去。故李山甫昔代孜歌,歌其幻梦曰:‘天使翰林生我前,相去歿来二百年。英神杰气归玄天,日月星辰空憾然。我识翰林文,不识翰林面。上天知我忆其人,使向人间梦中见。瑞光闪烁天关开,五云著地长裾来。华山秀作英雄骨,黄河泻作纵横才。巍峨宛似神仙客,一段风雷扶气魄。低头语了却抬头,指点胸前称李白。梦中一面何殷勤,高吟大语喧青云。白言天府偶闲暇,与我握手论高文。一论耳目清,再论心骨惊。豁如混沌初凿破,天地海岳何分明。利若剑戟坚,健如虬龙争。神机圣法说略尽,造化与我新精灵。不问尘埃人,不语尘埃事。樽前酒半空,归云扫筵起。自言天上作先生,许向人间为弟子。梦破青霄春,烟霞无去尘。若夸郭璞五色笔,江淹却是寻常人。’,”[18]卷9

张孜此诗之本事,又见《唐诗纪事》后《全唐诗》据此收录,误植于张孜名下。

前面提及的晚唐诗人张祜的《梦李白》是一首长长的叙事诗,记叙梦中的李白:“我爱李峨嵋,梦寻寻不见。忽闻海上骑鹤人,云白正陪王母宴。须臾不醉下碧虚,摇头逆浪鞭赤鱼。回眸四顾飞走类,若嗔元气多终诸。问余曰‘张祜,尔则狂者否?朝来王母宴瑶池,茅君道尔还爱酒。祜当听我言:我昔开元中,生时值明圣,发迹恃文雄。一言可否由贺老,即知此老心还公。朝廷大称我,我亦自超群。严陵死后到李白,布衣长揖万乘君。玄宗开怀死其说,满朝呼吸生气云。中人高力士,脱靴羞欲死。谗言密相构,送我千万里。辛苦夜夜归,知音聊复稀。青云旧李白,憔悴为酒客。自此到人间,大虫无肉吃;男儿重义气,百万呵一掷。董贤在前官亦崇,梁冀破家金谩积。匡山夜醉时,吟尔古风诗。振振二雅具,重现此人词。贺老不得见,百篇徒尔为。李白叹尔空泪下,王乔闻尔甚相思。尔当三万六千日,访我蓬

莱山。高声叫李白,为尔开玄观。’天明梦觉白已去,兀兀此身天地间。”[8]卷10

这两则“梦李白”,除了将“非主流”传说渠道中的李白形象,演绎得更加栩栩如生,同时还可以发现,后世诗人“梦李白”所寄托的寓意,是对李白精神的一种新阐释,而这种倾向表现得比较强烈。因此,“主流”和“非主流”的因素也常常会纠缠在一起,互为促进。这样的情况在唐诗学的传承与发展中处处可见,而李白的现象更为突出。

[参 考 文 献]

- [1] 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
- [2] 郁贤皓.咸淳本李翰林集渊流概述[M]//中国李白研究(2003-2004).合肥:黄山书社,2004
- [3]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4] 朱金城,朱易安.李白的价值重估[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 [5] 刘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6]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7] 孟棻.本事诗[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 [8] 张祜.张承吉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9] 李肇.唐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10] 段成式.酉阳杂俎[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1] 李潜.松窗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12] 陆游.老学庵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13] 皮日休.皮子文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4] 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5] 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16] 北京大学古文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17] 舒岷.贞素斋集[M].清道光刻本.
- [18] 何光远.鉴戒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责任编辑 杜 敏]

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Major and Non-major Trends of the Construct of Poetics in the Tang Dynasty —— Exemplified With the Major and Non-major factors in the History of Li Bai's Acceptance

ZHU Yir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issemin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Besides poetics itself,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 of Tang poetry should involve factors of other cultures, which constitute a complete system with poetics. Those non-major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oetics in the Tang Dynasty included the spread of tales about the poets in the time, development of dramatic novels associated with Tang poetry, reportage of artistic works and Tang poems in the course of acceptance, and change of life demand of poets and scholars in those days. All these played significant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ng poetry and were the dynamo which gave a permanent vitality to Tang poetry.

Key Words poetics in the Tang Dynasty; Li Bai; history of acceptance